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动态关系研究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孙长城¹ 张凤太¹ 安佑志¹ 吴建峰² 杨庆¹ 魏珍¹ 肖粤东¹ 杨兴雨¹¹

(1. 重庆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重庆 400054;

2. 贵州师范学院 地理与资源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18)

【摘要】: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度了成渝地区 2005—2018 年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并基于 ArcGIS10.3 软件进行了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①2005—2018 年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保持上升趋势,“双峰”格局显著。②耦合及耦合协调水平整体较低,阶段性特征明显,政策引导作用显著。③耦合协调重心始终以成、渝两地为中心迁移变化,“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初见成效,两大核心城市带动作用日益增强。未来,应进一步发挥成、渝两大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强化区域一体化意识,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旅游业 新型城镇化 耦合度 协调度 成渝双城经济圈

【中图分类号】:F59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8141(2021)03-0372-08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城镇化水平由 1978 年的 17.92% 增长至 2018 年的 59.58%,提升速度世界瞩目,但各地发展质量良莠不齐。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以工业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无法适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1],探索新的城镇化模式迫在眉睫。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为城镇化提供了动力来源,而旅游业因具有产业联动强、资源利用效率高等优势,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2],旅游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3]。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新的国家战略高地,在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占据重要地位。识别成渝地区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机制,有利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国内外有关旅游业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20 世纪末,Mullins P^[4]首次提出了旅游城镇化概念,并最先阐述了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旅游业可以使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并能调整城镇的产业结构。随着城镇旅游活动的增多和事件旅游的兴起,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出来。如,Chang T C、Milne S 与 Fallon D 等^[5]将旅游城镇化分为工业遗产旅游城镇化和新造旅游景点城镇化两种不同的模式;Akama J S、Kieti D^[6]以肯尼亚旅游小镇为例,研究了旅游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Kemp E、Childers C Y 与 Williams K H^[7]就旅游业如何提升居民素质,进而提升城市形象做了具体论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模式变迁影响研究”(编号:14CGL025);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基金“重庆三峡库区旅游业—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时空演变及优化调控研究”(编号:KJQN201901129);重庆理工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西南地区旅游乡村聚落‘三生’空间演变与农户生计转型的互动关系与微观机理研究”。

作者简介:孙长城(1995-),男,山东省济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张凤太(1979-),男,山东省沂南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资源安全与管理等。

关注到旅游城镇化的负面影响,认为旅游活动会加大生态环境压力,进而降低了城镇化质量^[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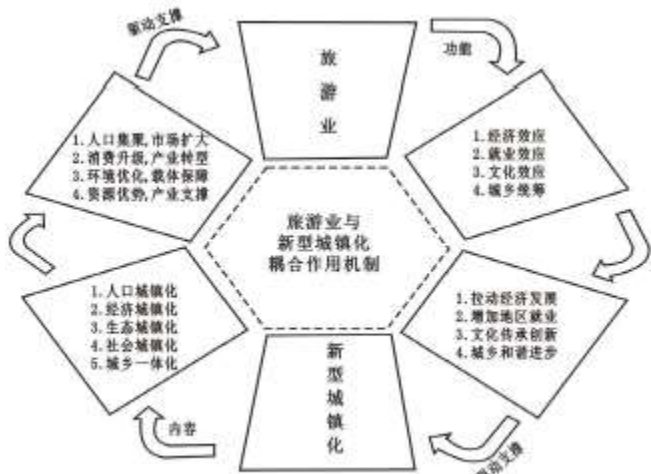
国内对旅游业与城镇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①理论研究。一个普遍观点的是,旅游业引导的资源、人口、经济等要素向城镇的集聚^[1],旅游供需关系的结合,政策导向和交通设施的完善是旅游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力^[9,10],而旅游引导的城镇化是一种新的城镇化发展模式^[11]。②两者的相互关系。朱贾莲莲^[10]认为,旅游业与城镇化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高楠、马耀峰、李天顺等^[12]认为旅游业与城镇化存在明显的耦合协调特征。众多学者通过对张家界、长山群岛和我国省域等案例地的实证研究,发现旅游业与城镇化存在双向促进作用^[13-16]。钟家雨、柳思维与熊曦^[3]基于“协同论”,认为旅游业与城镇化的协同发展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彭邦文、武友德与曹洪华等^[17],唐鸿、刘雨婧与麻学锋^[18],蔡刚与蔡平^[19],冉婷、杨丹与苏维词^[20]分别对云南省、张家界、中国省域、重庆市展开了研究。

综上所述,众多学者对旅游业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为本文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纵观已有研究,专家学者们多围绕省域和重点旅游城市,基于时间序列进行单一识别,较少有学者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并将时间与空间结合进行时空演化动态分析。基于此,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研究对象,选取 2005—2018 年面板数据,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研究分析了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以期拓宽研究视角,并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信息参考。

1 耦合协调机理与研究区概况

1.1 耦合协调机理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有明显的耦合协同关系,彼此相互促进、相互支撑^[21]。厘清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两者的作用机理,对促进二者融合、实现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理见图 1。



论旅游活动发生在乡村还是城镇,都有效加强了城乡之间的交流互动,且城镇地区的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这与打破二元壁垒,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观念相一致。④文化传承与城镇品牌。“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和旅游活动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文化又是一座城市最闪亮的名片,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要塑造独特的城市品牌。多元独特的文化是旅游业的核心吸引物,旅游活动的日益丰富也可以有效识别、展示、传承当地的特色文化,使城镇特色得以有效保存。

新型城镇化为旅游业提供发展契机与保障,具体体现为:①基础支撑。城镇地区聚集着丰富的生产要素,资源富集为旅游发展提供基础动力。内涵集约、绿色环保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将资源优势进一步放大,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的日益完善为旅游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②消费效应。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发新的消费需求,休闲度假则是现代人新的消费趋势,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发展契机。③产业融合。新型城镇化是一项综合性工程,“产城一体化”的发展理念促进了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丰富完整的产业结构不仅为旅游业提质增效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也为延伸旅游业产业链条提供了大量空间。④生态环境保护。“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重视生态文明、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让城市融入大自然,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型城镇是时代的责任,旅游业具有环境污染少、资源利用效用高等优势,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一致。⑤政策保障。旅游在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环境保护等方面作用明显,国内很多地区和城市都将其作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旅游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1.2 研究区概况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长江上游,地处四川盆地,是我国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城镇化区域,也是实施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 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首次提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概念,与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等概念一脉相承。会上强调,要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发挥联结东西南北、引领中西部发展的区位优势,进而探索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模式。

目前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行政范围尚未见到具体的规定,为了便于数据的统计,本文涉及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均参照成渝城市群的范围,即包括重庆、成都两大核心城市和自贡、泸州、德阳、绵阳、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雅安、遂宁、资阳、达州等地市,总面积约 18.5 万 km²,人口约 1 亿人,占川渝两地总人口的 90%左右。2018 年,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 6.6%,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2 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相关内容,明确了新型城镇化以高质量、可持续、生态化的基本内涵和追求“以人为本”的根本目标。遵循科学性、有效性、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则,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22-24],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 5 个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25-26],结合区域实际情况,从旅游市场、旅游经济、产业支撑和基础动力 4 个方面构建旅游业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表 1)。

表 1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性质	客观权重	主观权重	综合权重
旅游市场		入境游客接待人数	万人次	+	0.165	0.083	0.130
		国内游客接待人数	万人次	+	0.082	0.167	0.130
旅游经济		旅游外汇收入	万美元	+	0.177	0.071	0.124
		国内旅游收入	亿元	+	0.080	0.107	0.103

旅游业		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	%	+	0.022	0.272	0.044
		星级酒店数量	个	+	0.074	0.076	0.083
		旅行社数量	个	+	0.096	0.050	0.077
	产业支撑	客运总量	万人	+	0.064	0.056	0.066
		限额以上餐饮住宿业从业人员	人	+	0.099	0.032	0.062
		限额以上餐饮住宿业法人企业数	个		0.098	0.035	0.065
基础动力		居民消费水平	元	+	0.025	0.125	0.054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元	+	0.019	0.125	0.062
	人口城镇化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	0.017	0.082	0.046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	万人	+	0.167	0.123	0.148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	0.017	0.084	0.017
	新型城镇化		人均 GDP	元	+	0.046	0.093
经济城镇化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	0.038	0.046	0.052	
新型城镇化		人均财政支出	元	+	0.051	0.046	0.060
		人均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	美元	+	0.216	0.046	0.124
	生态城镇化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0.010	0.069	0.03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 ²	+	0.016	0.034	0.029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0.007	0.034	0.019
	新型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人均教育财政支出	元	+	0.041	0.010
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			元	+	0.036	0.010	0.024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册	+	0.126	0.021	0.064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	0.012	0.007	0.011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0.015	0.007	0.013
单位人口医院床位数			张/千人	+	0.031	0.007	0.018
单位人口卫生技术人员			人/千人	+	0.036	0.015	0.029
用水普及率			%	+	0.011	0.015	0.016
燃气普及率			%	+	0.021	0.018	0.024
空间城镇化		城市人口密度	人/km ²	—	0.008	0.053	0.026
	建成区占辖区面积比重	%	+	0.046	0.027	0.044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m ²	+	0.019	0.027	0.029	
城乡一体化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	0.002	0.068	0.014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	%	—	0.010	0.068	0.032

2.2 指标权重与综合发展水平计算

熵权法是一种通过指标离散程度来判断其提供有效信息量的多少,进而确定权重的客观计算方法^[24]。某项指标离散程度越大,提供的有效信息量越大,权重值越大,反之越小。

为了避免指标权重过于量化,本文首先综合主客观权重值。计算了各项指标的综合权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然后采用综合发展指数来表示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各项指标因量纲不同带来的影响。计算公式为:

$$\begin{aligned}
&\text{正向指标: } Y_{ij} = (x_{ij} - x_{ij\min}) / (x_{ij\max} - x_{ij\min}) \\
&\text{负向指标: } Y_{ij} = (x_{ij\max} - x_{ij}) / (x_{ij\max} - x_{ij\min}) \\
&\dots\dots\dots (1)
\end{aligned}$$

式中, Y_{ij} 表示第 i 年的第 j 个指标的标准化后的值; x_{ij} 表示第 i 年的第 j 个指标的原始值; $x_{ij\max}$ 表示指标 j 的最大值; $x_{ij\min}$ 表示指标 j 的最小值; $i=1, 2, 3, \dots, m$, 表示年份的个数; $j=1, 2, 3, \dots, n$ 表示指标的个数。

其次, 利用熵权法分别计算各项指标的归一化指标比重、相对信息熵, 差异系数, 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

计算公式为^[27]:

$$P_{ij} = Y_{ij} / \sum_{i=1}^m Y_{ij} \dots\dots\dots (2)$$

$$h_j = - \frac{1}{\ln m} \sum_{i=1}^m P_{ij} \ln P_{ij} \dots\dots\dots (3)$$

$$\alpha_i = 1 - h_i \dots\dots\dots (4)$$

$$w_j = \alpha_j / \sum_{j=1}^n \alpha_j \dots\dots\dots (5)$$

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AHP)^[28]计算主观权重 w'_j 。由于篇幅所限, 具体计算过程不在文中列出。利用最小相对信息熵原理计算得到组合权重 W' 。计算公式为^[29]:

$$W_j = \frac{\sqrt{w_j w'_j}}{\sum_{j=1}^n \sqrt{w_j w'_j}}, j = 1, 2, \dots, n \dots\dots\dots (6)$$

最后, 计算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计算公式为:

$$U_{i=1,2} = \sum_{j=1}^n W_j Y_{ij} \dots\dots\dots (7)$$

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反映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影响程度的定量指标, 原本作为物理学概念, 后来逐步用于生物、地理、经济和旅游等研究领域。本文借鉴已有研究^[25,30], 构建耦合协调模, 用于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关系特征。计算公式为:

$$C = \sqrt{U_1 U_2 / (U_1 + U_2)^2} \dots\dots\dots (8)$$

$$D = \sqrt{C \times T}; T = \alpha U_1 + \beta U_2 \dots\dots\dots (9)$$

式中, C 表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 U_1 表示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 U_2 表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 F 表示耦合协调度; T 表示耦

合协调发展水平指数; α , β 为待定系数, 本文认为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在系统中同样重要, 按照研究惯例, 取 $\alpha = \beta = 0.5$ 。

为了对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做出进一步的客观评价, 本文借鉴现有研究成果^[23,30,31], 对耦合与协调值进行了区间划分(表 2)。

表 2 耦合协调等级区间划分

耦合度区间	耦合等级	协调度区间	协调等级	发展阶段
[0, 0.3)	低水平耦合	[0, 0.1)	极度失调	失调阶段
		[0.1, 0.2)	严重失调	
[0.3, 0.5)	拮抗	[0.2, 0.3)	中度失调	
		[0.3, 0.4)	轻度失调	
		[0.4, 0.5)	濒临失调	
[0.5, 0.8)	磨合	[0.5, 0.6)	勉强协调	协调阶段
		[0.6, 0.7)	初级协调	
		[0.7, 0.8)	中级协调	
[0.8, 1.0]	高水平耦合	[0.8, 0.9)	良好协调	
		[0.9, 1.0]	优质协调	

2.4 重心模型

重心概念在地理学中常用于反映区域某一属性的空间变迁, 本文利用重心模型计算分析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偏离程度。计算公式为^[32]:

$$\begin{cases} \bar{x} = \frac{\sum_{i=1}^n M_i X_i}{\sum_{i=1}^n M_i} \\ \bar{y} = \frac{\sum_{i=1}^n M_i Y_i}{\sum_{i=1}^n M_i} \end{cases} \dots\dots\dots (10)$$

式中, (x, y) 为区域重心坐标; (Xi, Yi) 为各地市的中心坐标; M 为耦合协调度; n=16。

3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指标数据来自于 2006—2019 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社会统计年鉴》, 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各地市统计公报。部分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

4 结果及分析

4.1 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本文运用耦合协调模型, 分别计算了旅游业综合发展指数、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 以及二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表 3)。整体上看, 旅游业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呈稳步上升趋势, 平均每年提高 5.37 个百分点, 表明研究期内成渝地区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但从数值上看, 成渝地区 2018 年旅游业综合发展指数仅为 0.22, 整体发展水平仍较低。从各地市看, 成都、重庆两地旅游业综合发

展水平远高于区域整体发展水平,其他地市则全部低于区域发展水平,且各地市与成渝发展水平相差较大。旅游业作为一种资源依托型产业,大城市为旅游业提供的支撑条件和发展契机不言而喻,在吸引和服务游客等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先天条件,导致占据重要地位的国际旅游市场自然较多地流入成渝两大核心城市,相较于其他地市占据绝对竞争优势地位。

新型城镇化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总体上呈上升的趋势,表明研究期内成渝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根据成渝地区相关发展规划,选取 2011 年(成渝经济区)和 2016 年(成渝城市群)两个时间节点,将新型城镇化发展分为 3 个阶段:①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1 年)。综合发展指数平均每年提升 6.31 个百分点,但发展水平较低,2011 年综合发展指数为 0.341。②新型城镇化稳步提升阶段(2012—2016 年)。综合发展指数平均每年提升 3.06 个百分点,较前一阶段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内涵集约式发展理念在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方面初见成效。③加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2018 年)。综合发展指数平均每年提升 3.82 个百分点,2018 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接近 0.5,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上达到较高水平。总体来看,成渝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性特征明显,政策有力地引导了城镇化发展方向,目前区域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从各地市来看,呈现与旅游业子系统相同趋势,成、渝两地依旧保持绝对领先地位,其他各地市低于区域整体水平。不同的是,各地市新型城镇化水平与成、渝两地相差较小,新型城镇化建设相较于旅游业发展现出良好的区域一体化效果。

表 3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计算结果

年份	旅游业 发展指数 (U1)	新型城镇化 发展指数 (U2)	耦合度 (C)	耦合协调度 (D)	耦合阶段	耦合协调阶段
2005	0.05	0.21	0.36	0.21	拮抗	中度失调
2006	0.05	0.23	0.38	0.23	拮抗	中度失调
2007	0.06	0.25	0.39	0.25	拮抗	中度失调
2008	0.07	0.27	0.39	0.26	拮抗	中度失调
2009	0.08	0.29	0.41	0.27	拮抗	中度失调
2010	0.10	0.32	0.42	0.29	拮抗	中度失调
2011	0.11	0.35	0.43	0.31	拮抗	轻度失调
2012	0.13	0.37	0.45	0.33	拮抗	轻度失调
2013	0.14	0.39	0.46	0.34	拮抗	轻度失调
2014	0.15	0.42	0.46	0.36	拮抗	轻度失调
2015	0.17	0.43	0.47	0.37	拮抗	轻度失调
2016	0.19	0.45	0.48	0.38	拮抗	轻度失调
2017	0.21	0.47	0.48	0.40	拮抗	濒临失调
2018	0.23	0.50	0.49	0.41	拮抗	濒临失调

4.2 耦合度时空分析

整体上看,成渝地区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呈小幅度上升的趋势(图 2),整体处于拮抗阶段,表明两子系统之间仍处于相互探索、相互掣肘的状态。为了进一步研究成渝地区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的时空变化特征,本文将研究期分为 4 个阶段,以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和 2018 年 4 个时间节点的耦合度为基础,基于 ArcGIS10.3 软件进行可视化处理(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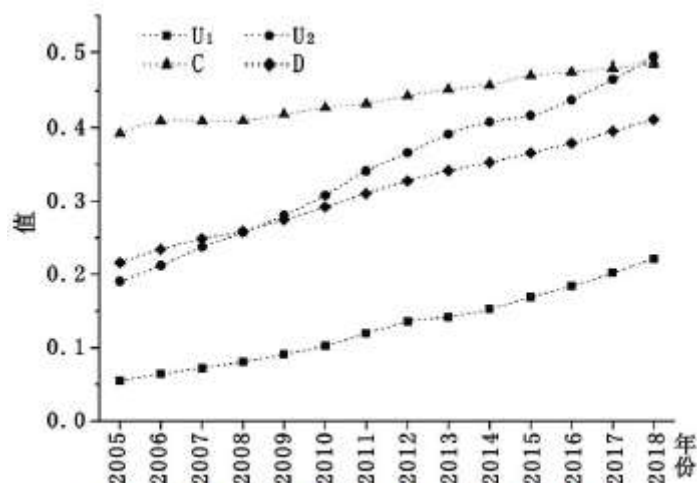


图2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及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从图3可见,2005年耦合度总体不高,各地市间相差较大。重庆处于磨合阶段,成都、绵阳等12个地市处于拮抗阶段,眉山、资阳、达州3个地市则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表明在早期阶段,观光为主的旅游活动和粗放式的城镇化模式相互作用并不明显。2005—2010年,耦合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取得阶段性进展。地处成、渝两地咽喉位置的资阳和成都腹地的眉山,耦合度均由低水平耦合提升到拮抗阶段。两大核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初显;2015年各地耦合度取得阶段性提升,成都进入磨合阶段,达州摆脱低水平耦合转而进入拮抗阶段。至此,成渝地区各地市全部处于磨合和拮抗两个阶段,区域差距明显缩小,区域一体化建设成果初步已经逐渐显露出来。2015—2018年,耦合度无明显变化,成都、重庆两大核心城市同处于磨合阶段,其他地市则同处于拮抗阶段,旅游业的转型升级与新型城镇化的深入融合发展处与探索阶段,“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旅游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总体而言,2005—2018年成渝地区各地市耦合度得到显著提升,实现了阶段跨越,各地市间差距逐步缩小,但目前各地耦合度仍然处在较低水平。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还未找到深度耦合发展之路,对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来说相对不足,未来还需进一步强化,以形成有效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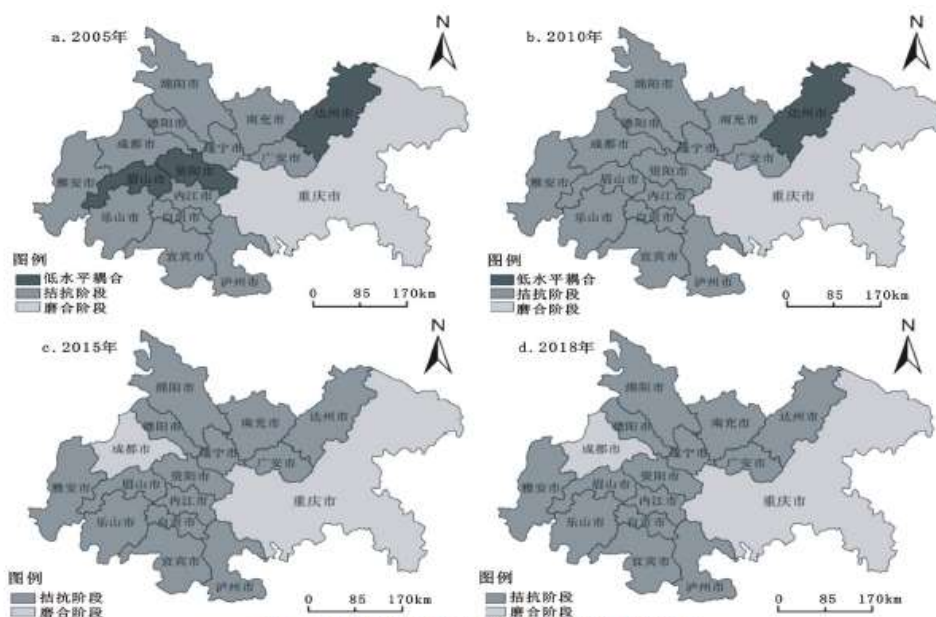


图3 成渝地区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时空格局

4.3 耦合协调度时空分析

从整体上看,成渝地区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值在 0.22—0.41 之间,处于失调阶段。与前文一致,选取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和 2018 年 4 个时间节点的耦合协调度值,并进行可视化处理(图 4),用以分析成渝地区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特征。

如图 4 所示,2005 年各地均处于失调阶段,成、渝两地处于轻度失调阶段,绵阳、乐山处于中度失调阶段,其他 12 地市处于严重失调阶段,在早期阶段,旅游业发展明显滞后于新型城镇化,较大的发展差距致使两系统发展不匹配,失调现象较为明显。2010 年耦合协调度明显提升,成、渝两地发展至濒临失调阶段,绵阳、乐山保持原状,其他 12 地市全部发展至中度失调阶段,旅游的快速的发展使得二者的差距逐渐缩小,不匹配发展状况有所缓和。2015 年耦合协调度实现质的飞跃,成、渝两地发展至勉强协调阶段,实现了从非协调到协调的飞跃,表明随着旅游产业深度发展,不仅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还可以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相匹配,共同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2018 年,成、渝两地耦发展至初级协调阶段,其他地市也有了明显提升,成渝两地合作发展日益密切,在资源共享与互联互通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对于推进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二者协调发展作用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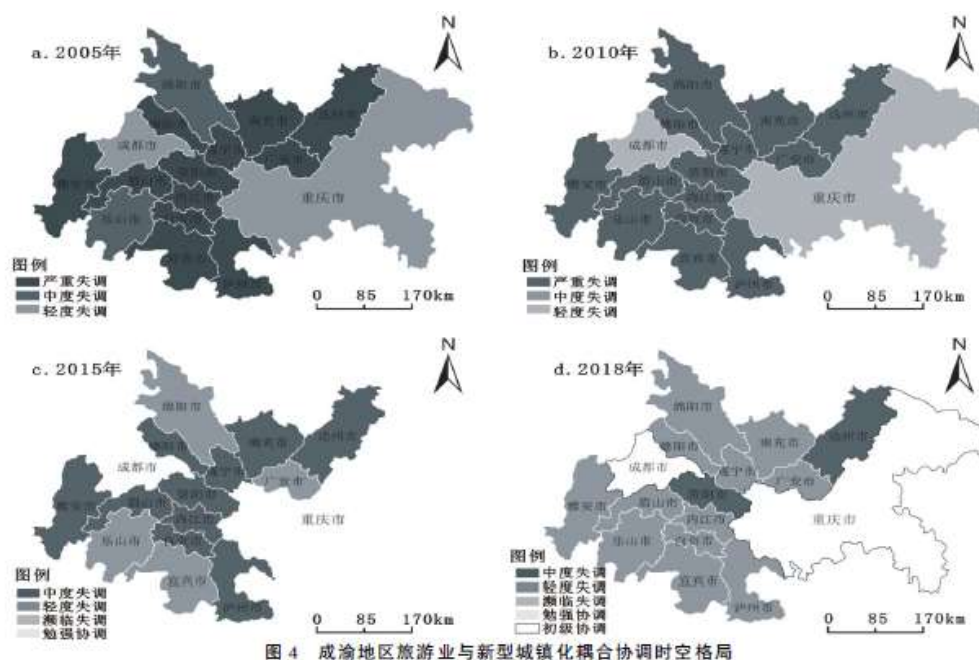


图 4 成渝地区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时空格局

总之,成渝地区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整体不高,成、渝两大都市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各地市间差距较为明显。旅游业发展水平整体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是二者失调发展的主要原因。随着旅游业的升级优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的日益成熟,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之下,二者携手共进实现协调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充分发挥成、渝两大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4.4 耦合协调度重心轨迹转移

本文利用公式(10)计算出耦合协调度的重心坐标,并将所得重心逐年连接,绘制成渝地区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重心轨迹迁移图(图 5)。

从图 5 可见,2005—2018 年,成渝地区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重心在 $105^{\circ} 7' - 105^{\circ} 11' E$ 、 $30^{\circ} 10' - 30^{\circ} 12' N$ 之间移动,东西方向移动大于南北方向移动,迁移重心集中分布于资阳。从地理位置上看,资阳位于成、渝两大核心城市咽喉之地,

说明成渝地区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基本围绕两大核心城市展开,“双轮驱动”发展模式明显。成、渝两地无论在资源禀赋、市场规模、政策运用等方面相较于其他地市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两大核心城市的带领下,地区不平衡性逐渐缩小,进而走向协调发展道路,符合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从时序来看,耦合协调重心大致经历了“东—南—西南”的迁移过程,阶段性特征明显,大致形成了“成都向东、重庆向西”的发展格局。各地应充分运用政策,抓住机遇,实现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共同进步,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日渐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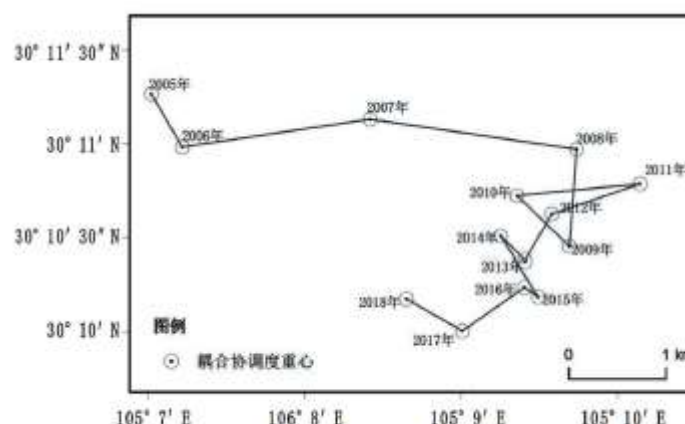


图5 成渝地区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重心迁移轨迹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实证分析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05—2018 年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系统之间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得到以下结论: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05—2018 年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均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旅游业整体上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两者均呈“双峰”格局,成、渝居于领先地位,“双核”发展模式明显。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05—2018 年耦合度指数呈小幅度上升趋势,整体上处于拮抗耦合阶段;各地市间差距明显,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经历了“低水平耦合—拮抗阶段—磨合阶段”的变化过程。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05—2018 年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整体上处于失调阶段,两者尚未实现协调发展。两大核心城市溢出效应逐渐显著,对各地市而言,抓住机遇、把握政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通过研究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得到以下启示:①在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唱好“双城记”,实现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与机遇下,各地要结合实际、把握机遇,携手打造成渝旅游环线,促进成渝两地旅游一体化建设,推动成渝地区旅游业转型升级,充分释放旅游业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②“双轮驱动”发展模式显著,但各地市间差距大的事实不可否认。未来应打造“两点开花,多点绽放”的组团式发展模式,进一步发挥两大核心城市的龙头作用,释放发展红利,进而提升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缩小各地市间差距。③明确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结合实际,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新城镇,提升人们的生活幸福感。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获取过程复杂、难度大,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加之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导致本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深入探索更加细致准确的数据支持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1] 赵磊, 潘婷婷, 方成, 等.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基于系统耦合协调视角[J]. 旅游学刊, 2020, 35(1): 14-31.

-
- [2]张广海,王新越.“旅游化”概念的提出及其与“新四化”的关系[J].经济管理,2014,36(1):110-121.
- [3]钟家雨,柳思维,熊曦.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J].经济地理,2014,34(2):187-192.
- [4]Mullins P. Tourism Urb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1, 15(3): 326-342.
- [5]Chang T C, Milne S, Fallon D, et al. Urban Heritage Tourism: The Global-local Nexu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 23(2): 284-305.
- [6]Akama J S, Kieti D. Tourism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ase Study of Mombasa Resort in Kenya[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7, 15(6): 735-748.
- [7]Kemp E, Childers C Y, Williams K H. Place Branding: Creating Self-brand Connections and Brand Advocacy[J]. Journal of Product & Brand Management, 2012, 21(7): 508-515.
- [8]Hein L, Metzger M J, Moreno A. Potenti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ourism; A Case Study for Spain[J].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09, 1(2): 170-178.
- [9]黄震方,吴江,侯国林.关于旅游城市化问题的初步探讨——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0,(2):160-165.
- [10]朱,贾莲莲.基于旅游“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旅游化”——桂林案例[J].经济地理,2006,(1):151-155.
- [11]陆林,葛敬炳.旅游城市化研究进展及启示[J].地理研究,2006,(4):741-750.
- [12]高楠,马耀峰,李天顺,等.基于耦合模型的旅游产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旅游学刊,2013,28(1):62-68.
- [13]麻学锋,孙根年.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与机制分析[J].旅游学刊,2012,27(3):36-42.
- [14]余凤龙,黄震方,曹芳东,等.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J].自然资源学报,2014,29(8):1297-1309.
- [15]王坤,黄震方,余凤龙,等.中国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研究[J].旅游学刊,2016,31(5):15-25.
- [16]高维全,李悦铮.长山群岛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32(1):96-98.
- [17]彭邦文,武友德,曹洪华,等.基于系统耦合的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以云南省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16,25(2):103-114.
- [18]唐鸿,刘雨婧,麻学锋.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效应评价——以张家界为例[J].经济地理,2017,37(2):216-223.
- [19]蔡刚,蔡平.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8,34(12):135-138.

-
- [20] 冉婷, 杨丹, 苏维词. 2007—2018 年重庆市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分析[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2): 1-11.
- [21] 杨主泉.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机理研究[J]. 社会科学家, 2018, (10): 85-90.
- [22] 王新越, 刘兰玲. 长江流域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9, 38(3): 12-17.
- [23] 赵建吉, 刘岩, 朱亚坤, 等. 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J]. 资源科学, 2020, 42(1): 159-171.
- [24] 张广海, 赵韦舒. 我国城镇化与旅游化的动态关系、作用机制与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 PVAR 模型分析[J]. 经济管理, 2017, 39(11): 116-133.
- [25] 李维维, 陈田, 马晓龙. 中国旅游化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关系的省际格局及形成机制分析[J]. 旅游科学, 2018, 32(5): 14-29.
- [26] 舒小林, 齐培潇, 姜雪, 等. 旅游业影响我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因素、机理及路径研究——基于西部地区 32 个旅游城市的数据分析[J]. 生态经济, 2018, 34(8): 105-111.
- [27] 王兆峰, 霍菲菲, 徐赛. 湘鄂渝黔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度变化[J]. 经济地理, 2018, 38(8): 204-213.
- [28] 李国兵, 田亚平. 珠三角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效度分析[J]. 经济地理, 2019, 39(3): 218-224.
- [29] 吴海泽, 余红, 胡友彪, 等. 区域生态安全的组合权重评价模型[J]. 安全与环境学报, 2015, 15(2): 370-375.
- [30] 张春燕. 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评价模型[J]. 统计与决策, 2014, (14): 28-31.
- [31] 廖重斌.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 热带地理, 1999, (2): 76-82.
- [32] 盖美, 展亚荣. 中国沿海省区海洋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 2019, 39(4): 616-625.